

河洛广记

文房四宝砚为尊

——洛阳砚文化略谈

□郑贞富



核心提示

砚,也称砚台,被古人誉为“文房四宝之首”。砚有陶砚、泥砚、砖瓦砚、金属砚、漆砚、瓷砚、石砚等。砚产生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,由研磨器和调色器发展演化而来,从原始到现代、从简单到复杂、从实用到观赏,最后成为功能繁多的艺术珍品。而在这个过程中,洛阳长期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,也一直是砚文化的中心,是当之无愧的砚文化圣地。



唐代辟雍砚(资料图片)

三代之际已有砚

明代王三聘《古今事物考》载:“自有书契,即有研砚。盖始于黄帝时也。”他认为砚起源于黄帝时代,即现代考古学上所说的仰韶文化时期。这一点已为考古学所证明。

黄帝部落活动的河洛地区,有着悠久的绘画艺术史。仰韶文化时期的日常用具如钵、缸、盆等彩陶器上的篮纹、绳纹、刻划纹等组成的图案是河洛绘画的原始形式。

1954年,洛阳孙旗屯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白衣为地绘黑三角弧纹、窄条纹和竖条纹的彩陶钵可以作为原始绘画的代表。这些彩绘陶器,上面所绘的图案,不是用一般竹木削成的笔所能表现出来的,而是用蓄水多、柔软又有弹性的毛扎起来才能描绘出的。因此,毛笔的雏形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出现的。由于墨和其他颜料需要研碎才能用毛笔书写,故必须有砚。

最原始的砚在黄河流域多有发现。今日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实物是1980年姜寨遗址中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的石砚,有砚盖,砚心微凹,这已经不是一般的研磨器,与汉代石砚极为相似。

《史记·封禅书》载:“昔三代之居,皆在河洛之间。”夏、商、周三代均以洛阳为都。文字的逐渐成熟及绘画艺术的成熟,都是与笔、墨、砚的制作技术相辅相成的。并且青铜器铸造技术也十分发达,以饕餮纹为代表的青铜纹饰有一种神圣和狞厉之美。春秋时,孔子入周问礼乐,参观周王室明堂,见到壁画有“尧舜之容,桀纣之像”的壁画。青铜器上铸造铭文,龟甲、兽骨上刻的文字及竹书简上书的文字,都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。

壁画创作离不开笔、墨、砚;青铜器上的绘画和文字及龟甲、兽骨上刻的文字往往需要着墨;竹书简上书写文字也离不开笔、墨、砚。

周代的砚,在洛阳曾出土有两方,一为长方形,以粗砂石磨光而成;另一为半形,玉质。两方砚面均残留有朱红色,说明这些石砚,当时仍兼为调色器。这时的砚,已出现砚盖。砚盖是指刻在砚上的文字及图案,据《大戴礼记》载,西周初就有砚铭:“石墨相著而黑,邪心谗言无得白。”

汉魏华砚竞风雅

汉代是中国砚和雕刻发展的重要时期,砚形发生变化,样式逐渐复杂,并有文饰雕刻,砚有足有盖,精致的砚经常雕刻蟠螭纹和各种动物形象,尤其是纸的发明,促进砚的生产和使用。

在这些砚中,陶砚占主导地位,称为极品的是民国时期洛阳出土,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一方汉代“十二峰陶砚”,高足,砚面呈箕形,砚的左、右、后三面塑有十二座山峰,水可由山峰下龙口滴入砚面,两边山峰上各有一负山人像。

东汉末年,都城洛阳被焚毁,曹操率军将汉献帝和文武百官都迎到许昌,送给汉献帝很多生活用品。曹操上了一道奏折,叫做《上杂物疏》,说:“陛下,现在臣献上来的都是当年先帝赐给臣祖父和父亲的御用器物。这些

器物,被臣的祖父和父亲供奉在家里,从来不敢用,臣觉得现在应该还给皇上。”这些器物最贵重的是三枚砚台,即“纯银参带台砚一枚,钝银参带员砚大小各一枚”。这些银砚台显然是东汉皇室作坊生产的御用品。

在魏晋皇室的御砚中,不仅有银砚,还有铁砚、漆石砚。文献记载,魏晋还有一种取河蚌为砚材的“蚌砚”。魏晋玄学家傅玄《砚赋》中说:“木贵其能软。”这说明还有木料制成的“木砚”,但到底怎样用木料制砚,现在没有实物可以参考。

但是,陶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是主要砚品,不但民间用,而且皇室用,如在邙山北魏宣武帝景陵出土的砚台即为陶砚。

馆藏唐砚多珍品

隋唐时期,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制砚工艺也有很大的发展。新中国成立后洛阳出土的唐砚众多,除少量是青石砚外,其他全部是陶砚或瓷砚。在这些砚中,以澄泥砚和辟雍砚最著名。

澄泥砚即以细泥为原料制成的砚,属陶砚一类。澄泥砚兴起于唐而盛于宋。1983年在洛阳老城东关外(隋唐东都城遗址)出土一初唐龟形澄泥砚,砚仅存前部,龟腹为砚池,前侧为一弯月形墨池,砚底有足,色灰,质地细腻。

辟雍砚,最早出现在汉代,在唐朝之前多为陶砚,唐朝多为瓷砚。辟雍,乃当时国立大学,其建筑形状为圆壁形,四面环水。辟雍砚是仿辟雍之形设计,砚台四周留有深槽储水,砚台中心高高隆起,下部用为数众多的珠足承托,匠心独具,形制奇特,可谓砚中一绝。

三大名砚耀西京

北宋以洛阳为西京,这里是文人相聚的文化之乡,会圣官石砚、魏州石砚、澄泥砚为三大名砚。

北宋米芾《砚史》介绍洛阳会圣官砚时,称“会圣官石,在溪涧中,色紫,理如琥珀,差硬,发墨不乏,扣之无声”。会圣官是北宋皇陵的祭陵奉先之所,也是陵区的管理中心,位于偃师市山化镇的凤凰山上。目前,会圣官已不复存在,但会圣官碑仍存。会圣官石砚是取凤凰山及周边之山的山涧之石而制成的。

魏州石砚是取洛河中上游的一种独特石料制成的砚,《砚史》说,该石“理细如泥,色紫可爱,发墨不渗,久之石渐损而硬,墨磨之则有泥香”。魏州,即汉魏弘农郡,辖今宜阳、洛宁、新安、卢氏、陕县等县,属隋唐东都、北宋西京洛阳的玉畿。

唐代辟雍瓷砚品种包括青釉、黄釉、白釉等,陶砚品种包括素陶、唐三彩、白釉绿彩等,从尺寸看有实用和陪葬明器两类用途。隋唐陶瓷辟雍砚在民间有所收藏,在考古发掘中也多次面世。其中最名贵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唐洛阳履道里(今安乐镇狮子桥村一带)白居易宅院遗址出土一枚辟雍瓷砚。该砚呈圆形,直径19厘米,砚面侈口,砚堂平坦凸起,周边有贮水凹槽。槽外一侧附有两个笔插,砚台底部有21个兽蹄状足。此砚器形规整,端庄大气,立意生动,用赏兼得,比起方形砚犹胜一筹。白居易在晚年仍留下不少诗文,这件朴素的唐代辟雍砚很可能就是诗人的文房用具。

澄泥砚,主要产于河南府(洛阳)沿黄河地区,即今新安、渑池、陕县区域。明代《河南郡志》、清康熙《河南府志》均载:“河南府澄泥砚,唐宋皆贡品,泽如美玉,击若钟声,坚而不燥,抚之如肌肤,贮墨不耗,积墨不腐。”澄泥砚的制作过程相对比较独特,制砚工匠从黄河水中筛得极细的泥土,制成结实的坯块,风干后雕琢成砚形,放在火中烧炼而成。北宋以后,澄泥砚与端砚、歙砚和洮砚并列为中国四大名砚。

目前,洛阳除澄泥砚外,诸多历史名砚的制作技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。小小的砚台,实际传承了河洛文化的根脉,孕育着文化产业创新的生机。

唐三彩灯:器型较罕见 华彩映盛世

本报记者白云飞 通讯员孙海岩文/图



文物名称:唐三彩灯  
文物年代:唐代  
出土时间:1987年  
出土地点:吉利区唐墓

核心提示

有人说,唐三彩更能诠释那个时代的富庶与繁盛。珍藏于洛阳博物馆的唐三彩灯,通体施绿、棕、白三色釉,华彩绚丽,技法超群,工艺考究,不仅是唐三彩中极为罕见的艺术瑰宝,还是大唐盛世的真实写照。



唐三彩灯

器型罕见 釉彩斑斓

在洛阳博物馆宽敞的展厅内,陈列的三彩俑精品不胜枚举,其中的三彩莲花灯,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“唐代流传下来的唐三彩器物比较多,但三彩灯较罕见。”洛阳博物馆副馆长高西省说,目前国内发现的三彩灯,其顶部多是烛台,是用来放蜡烛的,而这盏唐三彩灯顶部有一个盏,倒入油,加上灯芯,就可以使用了。它是国内目前发现少有的顶部为灯盏的唐三彩灯。

莲花灯器型端正,釉色斑斓,由灯盏、灯柱和灯座三个部分组成。最上面是灯盏,它由碗盏、莲花瓣盏托和托盘组成,内外均匀施有棕、绿、白三种釉色,像一朵盛开的莲花,造型十分优美。托盘下面是竹节状的灯柄,中部饰仰覆两朵荷花,两侧点缀多周连续小圆圈纹,被放置在一个倒扣的碗状底座上,底座上还有宝相花和力士的纹饰。

多元文化 盛唐华彩

在唐代以前,陶瓷器多为单色釉。唐代时期,多彩的釉色和纹饰在陶瓷器物上同时得到运用,这是经济发达、文化融合、中外交流的折射。

该灯盏上的莲花造型、灯座上的宝相花和力士纹饰,均源自佛教。莲花,代表净土,象征纯洁;宝相花被视为佛庄严之相,有“宝”“仙”之意,以某种花卉(如牡丹、莲花)为主体,加入其他花卉的形状结合而成;力士,是佛教中守护者的形象。这些造型、纹饰,都是流行于盛唐的装饰纹样。

高西省介绍,这件唐三彩灯虽然“个头”不大,通高44.5厘米,座径仅22.6厘米,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盛唐时期开放、自信、包容的风貌。

相关链接

速读“灯史”

中国古代的灯具种类繁多,其中陶瓷灯是使用时间最长、普及范围最广的灯具,主要分为油灯和烛台两种。不过在唐三彩器物中,三彩莲花灯的造型并不多见,所以显得弥足珍贵。

在电灯问世以前,人们普遍使用的照明工具是煤油灯或煤气灯。19世纪初,英国一位化学家用2000节电池和两根炭棒,制成世界上第一盏弧光灯。由于光线太强,只能安装在街道或广场上,普通家庭无法使用。无数科学家为此绞尽脑汁,想制造一种价廉物美、经久耐用的家用电灯。

1879年10月21日,美国发明家爱迪生通过长期的反复试验,终于点亮了世界上第一盏有实用价值的电灯。(云飞)

薛琚:礼宾不卑不亢 理刑注重证据

薛琚(shū),字县珍,北朝时洛阳人。历北魏、东魏、北齐三代,他善谋划,为官执法严厉。

薛琚出身官宦之家,其父薛豹子为北魏徐州刺史。薛琚最初为典客令,是负责接待宾客之官。每次待客,他礼节态度都非常优雅恰当,不卑不亢,受到北魏宣武帝高度赞赏。孝明帝正光年间,薛琚任洛阳令。都城之地,素为难治。他正人先正己,以身作则,整顿风气,其任职期间,洛阳社会秩序相对较好。他审案注重的是证据,以理服人,极少对犯人动大刑。有一年洛阳大旱,按惯例,要对京城的在押犯重新审理,朝廷这才发现整个洛阳关押犯人仅有3个。孝明帝对其才能大加赞许,赐物表彰。

他原与权臣领军元叉关系密切,元叉被废后,他忧惧

不安,以致“政教废弛”,故被免官。后来,他又投靠宠臣李神轨,被重新起用为吏部郎中、吏部尚书。他认为,州县官吏,直接理民,关系重大。因此,应加强选官制度。

薛琚有远见,足智多谋。尔朱荣当政时,薛琚为行台尚书,随元天穆征讨邢杲起义。同时,南梁武帝派大将陈庆之率兵数千护送投梁的北海王元颢北上,直指洛阳。而天穆兵力仅能应对一方。薛琚认为邢杲聚众无名,虽一时强大但不可畏;而元颢身为皇族,且号称“义举”,所以,应先打元颢,然后再转而灭邢杲。但由于元天穆优柔,又迫于众人意见,故未采纳薛琚的建议。结果,待其讨平邢杲,元颢已攻占洛阳。

东魏静帝天平初,高欢以薛琚为丞相府长史,军国大事多与他商议,薛琚也“推诚尽节,屡进忠谏”。有一

次高欢率军征西魏,欲从蒲津渡黄河。薛琚认为,西魏连年歉收,东魏应固守要道,坚壁清野,敌人难以久持,自会来归降;即便出兵,也应兵分两路,互为策应。高欢皆不纳,遂有沙苑大败。

后来,薛琚曾率兵讨击范阳卢仲礼之叛,遂转任殿州刺史。其间,他为政严酷,吏人苦之。后又为度支、殿中二尚书。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(公元550年),薛琚卒于尚书右仆射任上。



洛阳名人传

努力建设覆盖全社会的

公共文化服务体系

